

歐陽修《詩本義》的經學性質

郭全芝*

內容提要

近年來對歐陽修《詩本義》的研究逐漸增多，論者多看重其中的文學研究成分，因而評價很高，甚至有以為它開創了《詩經》文學研究的意見。筆者以為《詩本義》的經學性質突出。歐陽修撰寫此書的目的在於糾《詩經》毛、鄭訓釋之偏，以「達聖人之旨」，而並不在於研究《詩經》的文學問題，因為他認定《詩經》是蘊含聖人之道的經書。《詩本義》在內容上多是以《詩序》為依據來解說詩篇意旨，書中雖有「文學研究」成分但也是為揭示聖人之志服務的。

關鍵字：《詩本義》 經學性質 聖人之志 文學成分

* 淮北煤炭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

歐陽修《詩經》研究著作《詩本義》在近十年來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學界對它的探討逐漸增多。其中褒獎者甚夥，他們大抵是稱讚《詩本義》開創了《詩經》的文學研究，以「人情」和「文意」釋《詩》，從而糾正了毛、鄭許多穿鑿附會之說。這些看法的確與《詩本義》的實際情形有相合之處，筆者讀後所獲大焉，但又以為論者有時有些矯枉過正，對歐說過分拔高。實際上，《詩本義》是維護《詩經》經學地位的，它的解說是以聖人之說規範《詩經》意旨，其中的「文學研究」只是從屬於經學研究的一個成分。由於歐陽修看重《詩序》，他的解說深受其影響，所以多本《序》說詩，而且也往往兼有《詩序》式的穿鑿之嫌。

一、歐陽修對《詩經》的定性：儒學經典，聖人之用

歐陽修的《詩本義》是一部經學著作。這從作者本人對《詩經》性質的認識和他對解經者的要求兩個方面可以得到初步認定。

有關《詩經》，自孔子宣導學《詩》並有「思無邪」、「興觀群怨」等評說以來，學者多歸之為儒家經典，官方則讓其發揮「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官員則多以為勸諫之書，總之是視《詩經》為政治文獻，用於經邦治國。

歐陽修對《詩經》性質的看法沒有超越前賢。他非常明確地將《詩經》定性為體現聖人之志的經典，與《易》《禮》《樂》等儒家經典一樣，具有律法作用。《詩本義》卷十五之《詩解統序》說：¹

經皆聖人之言……

同卷《王國風解》中云：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

《詩經》與其他五經的不同之處在於：

¹ 本文所引歐陽修《詩本義》文字，均出於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源閣《四庫全書》(1987年)第70冊。

《易》《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

《詩》亦蘊含著聖人之「道」，而其要在於聖人之運用方使人能理解其間所蘊含的「道」。歐陽修有這樣的看法，原因是他以為《詩》並不出於聖人之手，所謂「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只是對於六經來源的一個籠統說法。《詩經》的創作主體比較特殊，它與聖人的關係也比較特殊。《詩本義》卷十四《本末論》說得非常清楚：

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系於彼，或系於此，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誡，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

在歐陽修心目中，聖人和《詩經》的關係就是如此。正是由於聖人就《詩經》「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誡」，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因此，《詩經》不再只是詩人單純的文學創作，而是蘊含了聖人之志的經書。歐氏曾經分析時人認為《詩經》不值得解說的因由，指出蓋有三端：「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繫之詞也，曰猥細之記也。」對此，歐陽修認為如果真是這樣，則「孔子為泛儒也」（《詩解統序》）。孔子既不是泛儒，《詩經》也就不是如上述內容的等閒之書。至此，我們可以說，歐陽修如同歷史上的多數《詩經》學者一樣，對這部經典的性質並沒有異於先儒的看法。

較為特別的是，歐陽修將作《詩》者、編《詩》者與解《詩》者作了細緻區分，尤其是對解《詩》者作出聖人和兩種經師的分別，提出解《詩》能「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才是理想的經師，而反對「妄自為說」的經師。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他研讀《詩經》感興趣的是《詩經》的經學式解讀，而非其他。

歐陽修既然對《詩經》以及解《詩》者有這樣的看法，所以其說《詩》很自然地持守經學立場，他的《詩本義》也因之成為一部經學著作。

對我們來說，《詩經》是一部詩歌集，它的文學性質本是毋庸置疑的。歐陽修作為文學創作大家，雖然身處經學比較昌盛的時代，而且自身對幾部儒家經典也投以經學家眼光，但他還是以其詩人的敏銳，看出了《詩經》與其他儒家經典相比，它的獨特地方。這就是，由於《詩經》不是聖人直接寫就的，它所

提供的文本材料是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詩人的作品，聖人通過對它的刪繁比次，依靠它的含蓄性而「著其善惡，以為勸誡」。由於詩歌的特質，詩人之意也不是直接道出，而詩人之意與聖人之志之間更有距離。如果不是經師的說明解釋，普通人是難以看出聖人借詩所明之志的。必須經過經師的解說，兩者才能彌合無間。所以解說者的目標，就是「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這是「經師之本」。而若「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反倒是「經師之末」。所以歐陽修解《詩》，目的不在於探討其文學性，不是要自立新說，也不停留在對詩人之意的探求上，而是要借詩人之意的探討來尋找出真正的聖人之志。這就是《詩本義》之既以詩人之意為本，又有以聖人之意為本的原因。其實是歐陽修將自己當作了經師。他雖然似乎將經師列在太師之後，但並沒有看輕經師的意思，而是把經師當作不可或缺的橋樑。只不過在他眼裏，前代經師的橋樑作用並非盡善盡美，需要完善，這才有了了解說《詩經》的想法。明白這一點，就不難明白歐陽修何以重視《詩序》，而對另立新說基本上持反對的態度。

歐陽修之所以作《詩本義》，也是因為他認為前人未能有效的借助解《詩》而體達聖人之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詩本義》也是一部經學著作。

二、歐陽修撰寫《詩本義》的目的：糾毛、鄭未善，

達聖人之旨

歐陽修之前，對於《詩經》的解釋是經學式的，人們對於《詩經》篇旨、內容甚至字詞的理解，依據的也主要是經學家的解釋。由於《詩經》的詩歌文體，使它能够被經學家輕鬆地引申附會。例如兩漢時期，經學興盛，說《詩》者不少，歧義也多，以致形成了不同的派別，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情況。當時經文本身雖然有不同「版本」，文字上有一些出入，但源頭所自，是同一部文獻，如果不是由於其特殊的體裁，歧義不應太多。歐陽修生活時代，唯有毛詩完整流傳，而《毛詩》一家之說又經唐代官方的疏證肯定，影響深遠，按理爭議可以平息了，但在唐末已然引起學者懷疑，也能說明問題。歐陽修承疑者餘緒，對《毛詩》進行了細細研讀，發現了不少新問題，這促使他產生了撰寫《詩經》新解的想法。

歐陽修在《詩本義》中多次談到了自己為何要撰寫《詩本義》的理由：

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初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卷末《詩譜補亡後序》）

毛、鄭二學，其說熾辨，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少。或失於疏略，或失於謬妄。（《詩解統序》）

《毛詩》之說，主要由《詩序》《毛傳》《鄭箋》構成。三者之中，歐陽修推崇的是《詩序》（這個問題，後文還要談到），不滿的是後兩者。不滿的原因則是這兩者的解說於《經》《序》《譜》有不合之處。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歐陽修更加強調的是它們與《詩經》經文不合，「或失於疏略，或失於謬妄」。因此歐陽修才認為有必要另撰新詞對前儒糾偏改誤。

前述文字似乎反映了歐陽修是以經文為依據來審視毛、鄭的，那麼他的糾偏也應該是以《詩經》文本為標準而另立新說。但其實並不那麼簡單。他還這樣說過：

後之學者因跡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於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

現存的《詩經》文本在他看來是「焚於殘脫之經」，本身就不完善，因此不能僅僅依靠它。經文之外，還應依據的就是《詩序》，理由是：

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詩本義》卷十四《序問》）

由於《傳》《箋》與《詩經》《詩序》的密切關係，歐陽修自云雖然已經「疑毛、鄭之失既多」，但是仍然「不敢輕為改易之」（《詩譜補亡後序》）。他說，除非遇見下列情況，否則就沒有必要改易前人之說：

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

所以《詩本義》的宗旨只是糾毛、鄭之偏，以使儒家《詩》說更為完善，其要不在於另立新論。《四庫提要》對《詩本義》的撰寫有一段論述比較客觀，它引述歐陽修語並評之云：

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²

結合前引《序問》一段文字看，這裏所謂「以意逆志」，顯然是以詩文之意逆聖人之志。這聖人之志，又大抵是指《詩序》之說。由是而言，說歐陽修《詩本義》是以經學家眼光看待《詩經》，其解說內容至少在其主觀上是屬於經說，而且主要針對毛、鄭二家經說做出修正，應該是沒錯的。

歐陽修對毛、鄭也不是齊等平視的，他說：

毛公當漢初興，去《詩》尤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為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為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

可見，歐陽修想做的也就是能正確理解聖人之志的經師工作。他之所以於毛、鄭兩家之中主從毛說，顯然不是因為《毛傳》的解說有文學研究的成分，而是與《鄭箋》相比，它「去《詩》尤近」，解說上「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總之，歐陽修是以聖人之志為準而選擇取舍的。他的工作是通過對毛、鄭的糾偏而使《詩經》的經學性解釋更加完善，更加精緻。

² 《四庫提要》文，見《四庫全書》第70冊。

三、《詩本義》的基本內容：依據《詩序》，解說

詩篇意旨

近年來，論者談及歐陽修的《詩本義》時，往往強調其對《詩經》的文學性研究，雖然也同時指出了其經學研究的成分，但兩者相比，給人留下的是「勸百諷一」式的印象。而實際上，《詩本義》的基本內容仍是傳統的經學式解說。

《詩本義》的內容也顯示出它的經學性。

不少學者之所以認為《詩本義》有文學研究的性質，是因為其中有用人情和文意解說詩意的內容。這個問題需要具體分析。歐陽修的解說，從表面上看，確實有涉及文學的內容，如多說《詩》的比興義，並往往用人情、文意批判先儒而說出自己的不同理解。但實際上，歐陽修正是借用所謂《詩經》多比興手法的特點將原本似無關聯的詩人之意與聖人之意結合起來；他之所謂批判，其實是因為前人例如毛、鄭的解說主要針對字詞、名物，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聖人之志或者不是歐陽修認為的聖人之志。

就歐陽修解說《詩經》的情況來看，其《詩本義》卷一至卷十二為主體內容，解釋具體作品。對這些作品，歐陽修的解說一般分兩部分、分別由「論曰」和「本義曰」領起。前者通常用於針對毛、鄭的解釋提出疑問，給予批駁，說出不同看法；後者則直接針對詩篇本文，講說字面意義，揭示經義。例如：開篇說《關雎》：

論曰：為《關雎》之說者，既差其時世，至於大義亦已失之。蓋《關雎》之作，本以雉鳩比後妃之德，故上言雉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為好匹，如雉鳩雄雌之和諧爾。毛、鄭則不然，謂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又不妒忌之行而幽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禦于文王，所謂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眾宮人爾。……

歐陽修不認同毛、鄭，原因是：

上言雉鳩，方取物以為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古之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

這裏出現了「人情」字樣，也有文意上的分析，但顯然歐陽修不認同毛、鄭的原因主要不是由於人情、文意方面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們的解說不符合「經義」。歐氏認為「《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按照《毛傳》《鄭箋》的解釋，卻「終篇無一語及之」，所以毛、鄭不確。而實際上，此詩從字面上看，本來就是「終篇無一語及之（文王太姒）」的情況，歐氏之「《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與毛、鄭之「三夫人九嬪禦以下」都缺乏文本材料的支援，也都是迂曲之說，不符合「古人簡質」的情形。歐陽修之所以能從《關雎》字面意義推出其經學意義，也大率與《詩序》一樣，是利用了《詩經》的文體特點。這也是學者以為《詩本義》能從文學角度解《詩》的主要原因。然而這樣的看法即使能夠成立，此種解釋方式也不是始於歐陽修。《論語》中孔子說《詩》，甚至於《左傳》引《詩》都帶有文學性的譬喻意味。至於《詩序》，更是充分利用了詩歌在表現手法上常用比興的特點，比附歷史，曲解《詩》旨。歐陽修的做法其實就是秉承《詩序》等傳統說《詩》的特點。且看其「本義曰」：

詩人見雎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別，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別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王。

講解詩意，細緻形象，又能解說其比喻義，文學意味確實濃厚。然而因為下面並未說明「淑女」何以謂太姒，「君子」何以謂文王，所以也可以看作是比附和曲解。歐陽修只是在篇末有這樣一段文字：

《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左右勤其職事……所以刺時之不然……

由此可見，他的解說主要依據是《史記》對於此詩創作時代的觀點，而不是《詩經》文本，與「人情」、文意關聯並不密切。其目的也很明顯，就是要盡可能地使詩人之意與聖人之志統一起來，於是也與前儒一樣，其解說難免牽強附會之嫌。這種情況在《詩本義》中並非孤例，而帶有較為普遍的特點。

歐陽修說《詩》，在內容上還有一個特點，即多以《詩序》之說為依歸。《靜

女》一詩，歐陽修批評毛、鄭，就是因為「毛鄭之說」，「考《序》及《詩》，皆無此意」。下面的文字似乎顯示出歐氏重視從《詩經》文本出發批駁毛、鄭：

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據文求義，是言靜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彷徨爾。其文顯而易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正靜女之「自防如城隅」，則是舍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伸其臆說爾。

若都是這樣的文字，自然能印證上面提到的觀點。但是，歐公還有論說：

據《序》言，「《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謂宣公與二薑淫亂，國人化之，淫風大行。君臣上下，舉國之人，皆可刺而難於遍舉，故曰刺時者，謂時人皆可刺也。據此，乃是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爾。以此求詩，則本義得矣。

如是，雖然「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看似非常符合《靜女》其詩的內容，但卻主要是依據《詩序》的一句話而得出的。可以設想，《詩序》若是別一種言論，歐陽修也會儘量使之與詩意相符的。如前舉《關雎》就很能說明問題。又如《鵲巢》一詩，《序》云：「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³ 歐陽修依據自然界中鵲、鳩的實際狀況和詩義，認為「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為《序》之失誤。然而《序》中其他說法，儘管歐陽修也認為詩意所無，卻仍然表示認同：

此《鵲巢》之意，詩人但取鵲之營巢用功多，以比周室積行累功以成王業；鳩居鵲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爾。其所以云之意，以興夫人來居其位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詩雖無文，但詩既言鵲成巢之用功多而鳩乃來居之，則其意自然可見。

但如果沒有《序》，詩中只是稱言鵲成巢之用功多而鳩乃來居之，其「周室積行

³ 《鵲巢序》，見《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阮刻本（1979年），第283頁。

累功以成王業」云云之意又如何「自然可見」？可見歐陽修也是強為《序》說。《詩本義》解詩，從《序》者為多。有些詩篇即使不從《序》，也屬於經學式解讀。

《序》之解讀《詩經》作品，其實也是繼承了先秦《詩》說的特點。除前述《論語》《左傳》外，《孟子》《荀子》等也是同樣情況。近年來被學界廣泛關注的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內容也多是對《詩》的比喻引申之說解。如「《關雎》以色喻於禮」，「吾以（於）《葛覃》，得氏初之詩。……夫葛之見歌也，則以葉萋之故也；後稷之見貴也，則以文、武之德也」。等等。⁴如前指出，這樣的《詩》說本身就建立在詩歌文體具有含蓄性的基礎之上，因而多少顧及了《詩經》的文學性。在《詩經》學史上，這種說《詩》特點形成傳統，被多數學者所認同，並非偶然。歐陽修對這一傳統也是認同的，而且由於他深厚的文學功底，還導致其《詩本義》在運用這種解說方式時比前儒更為講究。他用「人情」「文意」解詩，實際是為了完善傳統經學式《詩》說，使之更具有說服力。

《詩本義》的第十三卷包括《一義解》《取捨義》兩篇，「系讀者的讀《詩》簡記，就毛鄭訓詁優劣作比較，多就某字某句而議，不及全篇」。所以其內容也是經學性的。第十四卷為《時世論》《本末論》《邇問》《魯問》《序問》，「內容為作者就詩篇產生時代、讀者學習方法、《詩序》價值、《魯頌》性質等問題發表的個人見解」，也是為理解《詩經》經義服務的。第十五卷為《詩解》，共九篇，也談經學問題，這從題目上就有反映，如《二南為正風解》等。末卷是《詩圖》和《鄭氏詩譜補亡》，「是作者考察史籍、排定《詩經》作品時代世次的文字和圖表」，也與經學內容相關。⁵

綜上所述，歐陽修並不是想解說《詩經》的文學性內容，只是由於他本是文學大師，擅文喜詞，知道什麼樣的文字才算是好文章，對於毛鄭解說不精緻、不能將經義與詩文有機的結合起來等情況不以為然，才有了新的注說文字。所以他的解釋，儘管有很多是從《詩經》文本出發進行考查的文字，有所謂人情或文意的支持，但最終還是要歸結到經學內容上，尤其是歸結到《詩序》所說的詩旨上，這也是他為什麼重視《詩序》的原因。說到底，歐陽修想承擔的也僅僅是經師之職。他的解說，從表面上看，確實有涉及文學的內容，如多說《詩》

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文考釋·孔子詩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⁵ 本段引文見於鄒然《歐陽修的〈詩經〉批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2001 年第 3 期，第 57 頁。

的比興義，並往往用人情、文意批判毛、鄭而說出自己的不同理解。但實際上，歐陽修正是借用所謂比興將原本似無關聯的詩人之意與聖人之意結合起來；他之所謂批判，其實是因為毛、鄭的解說主要針對字詞、名物，不能有效地反映聖人之志或者不是歐陽修認為的聖人之志。

The Nature of Confucianism in Ouyang Xiu's Shi Ben Yi Guo Quanzh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Ouyang Xiu's Shi Ben Yi increases gradually. as researchers mostly think highly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on this book., they give a high appraisal of it, someone even regard it as the first book opened up the literary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The author illustrates the nature of confucianism in Shi Ben Yi is greatly obvious. Ouyang Xiu wrote this book in order to refute Mao's and Zhen's falsehood of the talks on The Book of Songs, to 'seek for sage's will', instead of to study the literary aspect of The Book of Songs. That's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The Book of Songs is a Confucian book contains the sage's doctrine. In the content, Shi Ben Yi mostly based on Preface to Book of Songs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e songs. Although this book includes some literary research element, it's also for the sake of revealing the sage's doctrine.

Key words: Shi Ben Yi the nature of confucianism the sage's
doctrine literarynes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